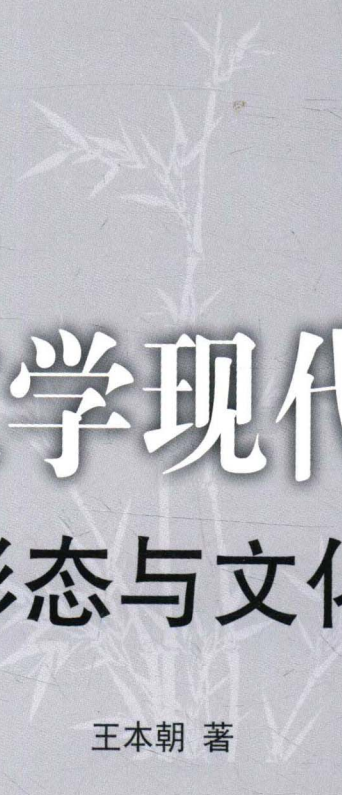




文学现代： 制度形态与文化语境

王本朝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文学现代： 制度形态与文化语境

王本朝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装帧设计：朱晓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现代：制度形态与文化语境/王本朝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ISBN 978 - 7 - 01 - 015275 - 2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 - 现代文学史 - 文学史研究②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文学史研究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2828 号

文学现代：制度形态与文化语境

WENXUE XIANDAI; ZHIDU XINGTAI YU WENHUA YUJING

王本朝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350 千字 印张：23.25

ISBN 978 - 7 - 01 - 015275 - 2 定价：55.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西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文库总序

这套丛书由西南大学文学院策划、组织。西南大学文学院的前身可追溯到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1940年设置的国文系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1942年设置的国文专修科。1950年10月，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合并为西南师范学院，两个学院的国文系随之合并为中国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重庆大学中文系并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56年更名为汉语言文学系，2003年7月成立文学院。2005年7月，西南师范大学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西南大学，揭开了文学院发展的新篇章。70多年来，许多大师鸿儒、名家先贤汇聚于此，研读学术，传承文脉。1949年前，有胡小石、吴宓、高亨、商承祚、唐圭璋、台静农、罗根泽、詹鍈、李何林、魏建功、李霖野、李何林、赖以庄、吴则虞、舒芜等大师曾在这里潜心治学，为学院奠定了仁爱醇厚的文化精神和严谨求实的学术传统。1949年后，有吴宓、高亨、赖以庄、钟稚璩、郑思虞、吴则虞、何剑薰、徐德庵、杨欣安、徐无闻、魏兴南、曹慕樊、李景白、谭优学、李运益、刘又辛、荀运昌等大批学者继续在此传道授业，筚路蓝缕，为学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代代薪火相传，才有了学院独具气质的学风、学术和学派。而今的文学院，已建成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以及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并在美学、书法和语文教育等学科多有创获，特色鲜明。它将尊重传统精神，遵循现代理路，开拓创新，创造无愧于先贤，无愧于时代的学术贡献。

这套文库是西南大学文学院学科建设新成绩的展示，所收书稿体现了两个特点：

第一，入选文库的作者均为文学院第一批博士生导师。这些作者都系统地受过现代学术的严格训练，对当前国内外最新学术文献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入选文库的著作及作者分别是：《文学现代：制度形态与文化语境》（王本朝）、《明代文人结社与文学流派研究》（何宗美）、《唐代文学与思想文化论集》（刘明华）、《书法的观念与实务》（曹建）、《视觉文化与当代文化批评》（肖伟胜）、《电影四维论：本体、历史、艺术与市场》（余纪）。作者均为重庆市各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对文学院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第二，入选文库的著作或论文均为作者精心挑选的代表作。这些成果，不论是刚完成的新著，还是已发表论文的结集，它们或在文学专题研究，或在文学思潮、流派，或在文学制度，或在视觉文化、书法、电影艺术等方面，体现了作者在其专业领域的创新性和开拓性。它们或注重文本分析，或突出过程研究；或表文化关切，或偏义理考据；或逻辑推演，或审美感悟；虽方法各异，但却都有着言之有据、言之有物、言之有理的共同特点。

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一直是学院的基础性和目标性工作。众所周知，学术乃学者安身立命之本，教授既是教书育人之师，也是学术研究之中流砥柱。大学因有一批潜心于学术之学者和教授，乃为大学之标志。为了更好地促进学院科学研究工作，加强学科建设，推进学术创新，在西南大学组建10周年暨办学110周年校庆到来之际，文学院推出“西南大学文学院博导学术文库”，这既是对学校110华诞的献礼，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院长期以来重视学术研究的历史积淀和在学科建设上的孜孜追求。

值此百年校庆之际，谨以此“序”献给那些开创和建设中文系和文学院历史的人们，并预祝学院的明天更加辉煌灿烂！

王本朝

2015年11月20日

目 录

西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文库总序	1
------------------------	---

第一编 制度形态:文学的生产方式

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体制问题	3
文学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学	17
晚清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	29
网络诗歌的文学史意义	38

第二编 文化语境:基督教的涟漪

西方文学悲剧意识的宗教背景	49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	60
中国现代诗歌中的上帝意象	88
基督教与鲁迅文化心态阐释	100
周作人与基督教文化	111
郭沫若与基督教文化	126
曹禺与基督教文化	136
作为可能的价值资源:吴宓的宗教思想	147

第三编 文体形式:白话文观念与实践

白话文运动中的文章观念	161
-------------------	-----

欧化白话文:在质疑与试验中成长	183
白话文的说理优势:以朱自清的论说文体为中心	201
老舍小说文体形式的自觉与创造	214
冰心散文风格的传统资源	223
传统的潜伏:苏雪林的文笔论和道德观	231
简练的口语:当代文学的语言问题	243

第四编 文学周边:思想的与美学的

尚力思潮与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转型	259
论近现代尚力美学思潮	269
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发生与转向	280
以美育代宗教与中国现代美学的身份认同	287
作为“无物之阵”的流言与鲁迅的精神世界	298
生存体验与知识趣味: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的批评	313
在时代的风陵渡口:郭沫若与现代中国的权势转移	325
论端木蕻良小说创作的美学意蕴	336
《西方美学史》与中国当代美学的知识建构	345
参考文献	357
后记	365

第一编

制度形态：文学的生产方式

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体制问题

洪子诚先生在《问题与方法》中提出并讨论了当代文学中的“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问题。文学体制是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机制和文学场域，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生产也有自己的文学体制问题^①。文学体制作为文学生产的秩序力量，关涉到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权力、想象与规则等。因此，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探讨。人们对文学的社会背景、文学出版与传播、文学社团与流派、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都曾有过深入研究，已经涉及到文学的体制问题，但却没有建立起文学体制研究的整体性和理论视野，缺乏文学制度研究的“自觉意识”。文学的体制问题无论是对中国文论建设还是中国文学史研究而言，都应该成为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学术话题。

从传统向现代的文学转型，文学生产方式也有从个人写作到制度写作的转变。文学不再是个人的意识观念和语言形式，而成为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占有和争夺的文化场所。现代职业作家的创作机制，报纸杂志的传媒机制，读者接受的消费机制，文学社团、文学机构的组织机制以及文学批评与审查的规约机制等等，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体制力量，同时也可看作是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它对文学的意义和形式起着重要的支配、控制和引导作用。借助于体制力量，现代文学也被

①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232页；旷新年：《1928年：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纳入了到社会运行空间，成为现代中国社会发展与变化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文学是作家审美想象和情感体验的产物，同时也是文学生产体制创造的结果。文学的生产过程形成了一套制度形式，借助于文学体制，文学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对社会的影响，才可能被社会所接纳和承认。文学体制作为文学的生产机制，既是文学生产的条件，也是文学生产的结果，它虽然是文学的外部力量，但却无处不在，渗透在文学与社会、创作与接受的全过程。布迪厄提出了“文学场”概念，文学场也就是文学生产体制，他认为：“文学场和权力场或社会场在整体上的同源性规则，大部分文学策略是由多种条件决定的，很多‘选择’都是双重行为，既是美学的又是政治的，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的”^①。彼得·比格尔也曾认为：“文学体制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中具有一些特殊的目标；它发展形成了一种审美的符号，起到反对其他文学实践的边界功能；它宣称某种无限的有效性（这就是一种体制，它决定了在特定时期什么才被视为文学）。这种规范的水平正是这里所限定的体制概念的核心，因为它既决定了生产者的行为模式，又规定了接受者的行为模式。”^② 陈思和曾把在社会的非常时期而没有公开出版、发表的文学称为“潜在写作”，即“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力的作家在哑声的时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③。“潜在写作”说明社会对文学构成了强大的控制和约束力量。因此，也可以把在文学体制中的写作称之为文学的“制度写作”，它不是一般意义上人们所说的为制度而写作的“载道文学”，而是经过文学体制的默许或参与下的文学写作。文学体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文学“只能是这样，必须是这样”的存在状态。

近年来，人们也常使用“现代性”来描述中国文学的意义。事实上，现代性也是中国文学现代体制的产物，现代性既指文学的思想、情

① [法] 布迪厄：《艺术的法则》，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页。

② [德] 彼得·比格尔：《文学体制与现代化》，《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③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感、语言和形式，还包括生成文学现代性意义和形式的文学体制。文学的意义和形式诞生于文学体制，文学体制也是文学现代性的组成部分。以报刊杂志、印刷出版等大众媒介和图书流通形成的文学的物化形式，以稿费、市场、社团为支撑的职业作家群的出现，以文学编辑、文学批评、文学检查和奖励所形成的文学意义的阐释和监督机制，它们同时也生产和决定着文学的意义。

因此，就文学而言，现代性至少应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文学审美的现代性，二是文学制度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现代性，主要体现为个人主义思想、人道主义精神、个体生命的存在体验以及白话文体的自由形式。现代文学以文学审美方式为个人主义价值立法，确立了人的独立与自由意义；同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自觉担当历史的责任和义务，以人道主义精神和态度执着于人的生存境遇和命运的表达和审视。现代作家的生存体验是文学现代性最为本真的创造力量，现代文学是现代生活、情感、心理和思维的审美形式，有着现代社会的历史印记，更有现代作家的生命体验和个人感受。如鲁迅的“孤独”、穆旦的“痛苦”、张爱玲的“荒凉”等都是独特的现代体验，正是他们创造了现代文学的美学个性，创造了文学的审美现代性。社会观念和思想常常趋于相似或一致，但个人的心理感受和生命体验则充满了鲜活和个性。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有着异域背景和传统基础，浸润着生命体验和心理感受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就具有丰富的个人性和原创性。白话文是现代文学最为基本的语言表达方式，它拥有开放而多样的语言资源，激活了写作者的想象力，它的自由、灵活的表达方式，创造了现代文学审美形式的生动与丰富。现代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运用了多种技巧，机智而灵活地创造出多样而个性化的文体形式。鲁迅曾主张：“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①语言表达的“现代的”、“自己的”、“活着的”与“直白地”等特征，正是现代白话文追求的审美目标。周作人认为：“文学是以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的独特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

^① 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一个东西。”^①文学所具有的独特的思想感情，美妙的艺术形式和“愉快”的审美感受，这些都是现代文学审美现代性的标志。

文学现代性还包括文学的制度现代性。舍勒认为，现代社会正发生着一场总体转变，包括社会制度和精神气质的结构转变。“现代性不仅是一场社会文化的转变，环境、制度、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转变，不仅是所有知识事物的转变，而根本上是人本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动、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②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它有文学意识和表现形式的转变，如一般文学史上所描述的五四文学革命，多集中在文学意义和语言形式的变迁，事实上，文学变革也有文学体制的建构，依赖文学体制的支持。传统文学生存于小农经济的社会背景，文学的生产、流通和传播受制于迟缓的生产力和严密的伦理意识控制，文学生产有着显著的个人性和内在性，文学流通和传播也局限在人际传承和手工作业方式，没有形成独立完备的文学体制。现代文学变革既是一场审美意识的革命，也是文学体制的革命。对作家而言，拥有职业化和社团化体制形态，对作品而言，有报纸、杂志、出版的支撑，对读者而言，有文学评论、论争和文学审查与奖励的监督与规约。文学体制是文学存在的网络，如同河水的河床，电子文件的运行程序。中国现代文学的职业作家创作机制，报纸杂志的传播方式，社会读者的接受方式，文学社团的组织机制，文学批评的约束和引导功能等，它们共同构成现代文学的制度形式，成为现代文学现代性的重要内容。

二

中国现代文学是由多种社会资源和力量共同参与建构的产物。现代的大众媒介、文学出版和文学教育参与了文学的创造，形成了文学生产的传播与流通渠道，并建立了文学的阅读机制。晚清以降，科举制度的废除，现代都市的形成，以及报刊杂志、学校学会和书局等组织的创建，既为作家提供了生存之所，又为他们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精神空间。新式

①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4页。

②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页。

学校培养了大量的新文学作者和读者，形成了职业化的作家群和知识化的读者阶层。文学教育包括大学文学课程的设置、文学教师、文学教材的编写以及语文的基础教育，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社会对文学的接受、欣赏和想象。现代的出版和报刊为文学与社会、作家与读者架设了快捷的通道。现代文学以文学报刊为中心形成了文学的传播制度。朱光潜就曾说过：“在现代中国，一个有势力的文学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广大，更深长。”^① 文学报刊有发表、组织和引导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功能，它既是文学传播的载体，也是文学与社会的中介，由此，文学成为了一种书籍和读物，甚至直接影响到文学内容、题材和风格，促进了文学形式的变革，催生出各种带有报刊体特征的文学文体，如随笔小品、杂文、连载小说和报告文学等，文学语言形式也日趋走向口语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沈从文对文学媒介的作用也有独到的认识，他认为：“报纸分布面积广，二三年中当可形成一种特别良好空气，有助于现代知识的流注广布，人民自信自尊新的生长，国际关系的认识……这一切都必然因之而加强。在文学方面，则更有助于新作家的培养，与文学上自由竞争传统制度的继续。这个制度在过去，已有过良好贡献。”^② 文学报刊就是文学和作家的生存方式，它创造了文学的市场，推动了作家的职业化和文学的大众化。文学报刊还具体参与作家和作品的运作。《小说月报》就对冰心有过精心的“打造”，从《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1号发表冰心散文《笑》开始，到1930年第21卷第1号发表小说《三年》，冰心在《小说月报》上共发表了20多篇小说、散文和杂谈。冰心一时声名鹊起，社会影响远在同时期的许地山、庐隐、王统照和王鲁彦之上。在举荐和介绍冰心的过程中，《小说月报》采用了种种办法，如发“预告”，《小说月报》12卷3号、6号和10号都刊有冰心作品《超人》《爱的实现》和《最后的实现》的预告。登“通信”，《小说月报》常有意地刊载购买冰心作品的来信；还有就是加“附注”，《超人》是继《笑》之后，冰心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第二篇作品，刊于第12卷第4号，在其题目之下，茅盾以“冬芬”的笔名加了一个附注：“雁冰把这篇小

① 朱光潜：《我与文学及其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② 沈从文：《新废邮存底·22》，《沈从文文集》第12卷，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第65页。

说给我看，我不禁哭起来了！谁能看了何彬的信不哭？如果有不哭的啊，他不是‘超人’，他是不懂得吧！”这显然是自导自演，用意在为冰心作品制造传播和接受的先导性舆论，把冰心置于新文学的显著位置。第四，就是发“征文”。在冰心《超人》发表以后，《小说月报》立即对它的批评进行征文，它是《小说月报》对冰心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特别征文”。题目是：“对于本刊创作《超人》（本刊第四号）、《命命鸟》（本刊第一号）、《低能儿》（本刊第二号）的批评。”期限：“以本年七月十号为收稿截止期。”报酬：“甲名十五元，乙名十元，丙名五元，丁名酬本馆书券。”在“征文启事”中，还明确规定字数限为三千，三千以上者“仍极为欢迎”，“惟未滿二千五百者，恕不能认为合格”。对于来稿，“在本月刊第十二卷第八号择优登载”^①。在作品发表以后就迅速组织人员进行讨论的做法，在《小说月报》历史上也例不多见。第五，就是刊“约稿”。在《小说月报》12卷4号上有冰心的“文艺丛谈”，这是编辑的一篇约稿。照规矩，《小说月报》的“文艺丛谈”一般都由编辑自己完成，“外人”只有俞平伯和冰心。因此，可以判定这篇“文艺丛谈”是对冰心的约稿。《小说月报》在完成了对冰心的倾力推荐之后，开始通过开设“创作批评”专栏，对冰心的创作展开大规模的文学批评。“创作批评”栏目设于《小说月报》第13卷第8号，终于13卷9号，一共刊出了6篇批评性的文章。除去其中一篇批评《商人妇》和《缀网劳蛛》的文章外，其它都是针对冰心作品的批评，一共9篇文章。这也说明冰心得到了《小说月报》的特殊关照。可以说，在媒介还没有被政治权力化的时候，一个刊物关照谁，谁就是最有福分的了。事隔一月，在《小说月报》第13卷11号上，又刊登了3篇批评冰心的文章。如此大规模而连续地对冰心展开文学评论，实属《小说月报》的唯一。随着传统士绅结构的解体，新兴知识阶层的兴起，创建学会与社团组织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显示自身力量的重要途径。对现代文学而言，文学社团的兴起和运作是文学体制力量的重要表现，现代作家和作品都被编织进了或紧密或松散的文学社团，文学有了被计划、被组织的

^① 《小说月报》第12卷5号，1921年5月10日。

规范性，有了强烈的人为性和群体性特征。

文学论争和批评也是文学意义生产和秩序建立的重要手段。翻开现代文学史，五四时期有文言与白话，新文学与学衡派、甲寅派，问题与主义之争，20世纪30年代有“左联”与新月派、与民族主义文艺、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40年代有“暴露与讽刺”、“与抗战无关论”和“真伪现实主义”等论争。一部现代文学史常被叙述成文学的论战史，问题并不完全出在文学的叙述方式，也表达了现代文学的一种存在事实，文学借助论争吸引社会注意力，获取话语主导权，重新分配文学资源。论争重心并不在概念本身的阐发上，而是尽可能地划定概念外延所能达到的最大“势力范围”。文学论争常演变成为“势力”与“中心”之争，如同前人所言，文学论争不但是争正统和注册权，也是为了“新文学的规范的问题”^①。新文学的“规范”，也就是文学新秩序与体制的建立，文学标准的设定，它不容许芜杂文学现象的生长，扰乱文学秩序，而以宏大、权威的话语出现，将异己话语排斥或整合进自己的话语系统。对文学规范的诉求，早在新文学之初期就已露端倪，并逐渐成为新文学的体制力量。现代文学的生长空间并不如后来者想象的那么开阔和自由，旧文学的“无物之阵”，新文学的派别之争，都消耗了作家们过多的文学精力，浪费了时间，使他们难以专心于文学创作，不得不走一步看一步，常常需要应付突发的文学事件。总的看来，现代文学有文学论争的喧嚣，有文学批评的设计和满足，但却欠缺文学创作的沉静和厚实。文学论争机制的建立并不完全是文学内部的事，更多是来自社会现实的压力，旧文学的潜滋暗长，使新文学不得不时时提防外界的围攻和内部的红杏出墙。文学被作为社会化的工具，与社会现实保持步调一致，从而实现文学强大的现实力量。一个个文学论争，最终都通向了文学秩序的整合，社会欲望内化于文学体制，在不经意之间完成了文学内部秩序的建立。

现代文学所面对的审查制度也值得重视。菲舍尔·科勒克说过：“无一社会制度允许充分的艺术自由。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

① 林崇：《现阶段的文学论战》，光明书局1936年版，第2—3页。

界限”，“社会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期待、希望和欢迎某一类创作，排斥、鄙视另一类创作。这样，每个社会制度就——经常无意识、无计划地——运用书报检查手段，决定性干预作家的工作”^①。文学批评、文学奖励可以激励和引导文学创作，文学批判和文学检查可以抑制和干预文学。书报检查是现代中国的一项文化制度，意在控制思想和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和阶级矛盾越突出，意识形态的控制也就越严密，文学生产也容易受到文化的审查和查封。1914年，袁世凯制定并颁布了《出版法》，这也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生长背景，当时的《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和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都曾被禁止销售^②。1930年，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出版法》，分“总则”、“新闻纸及杂志”、“书籍及其他出版品”、“出版品登载事项之限制”、“行政处分”和“罚则”6章，它加强了对文化出版的登记、审查和限制，并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如行政“处分”、经济“罚款”和“拘役”等^③。1932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增订192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宣传品审查条例》为《宣传品审查标准》，把宣传分为“适当的宣传”、“谬误的宣传”和“反动的宣传”。国民党的政治专制逐渐扩散到对整个文化思想领域的控制，进步文学、左翼文学受到了国民党专制政策的严密监视和查禁。有了所谓的“出版法”，文学就有了被禁止、被审查的理由，文学家就有了被拘役的危险。同时，文学家也在审查中发明和创造了文学生存与发展的策略和智慧。在文化专制的时代，文学始终以反叛和抗争姿态争得了自己的生存地位，尽可能地创造了自由的精神空间。现代的文化审查制度为我们考察和理解文学的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如果没有文化的专制与规约，现代中国文学会不会是另一番景象？

文学奖励也是一项文化政策，对文学的生长与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文学奖励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政府奖励和民间奖励，杂志社

① [德] 菲舍尔·科勒克：《文学社会学》，载张英进、于沛编：《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② 阮无名：《新文学初期的禁书》，载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50—54页。

③ 《中国年鉴》第4卷，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2—3144页。